

解 放 军 英 雄 传

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二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解放军英雄传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850×1188毫米 32开本 14.876印张 330 000字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7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0000

ISBN 7-5065-0045-0/I·9

统一书号: 10185·189 定价: 3.30元

出 版 说 明

为了向部队指战员、广大民兵、学生和青少年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爱国主义、革命英雄主义读物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，培养更多的“四有三讲两不怕”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我们编辑出版一套《解放军英雄传》丛书。这套丛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所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，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。

本卷为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二，共收集了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十九名。其中有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董存瑞、郅顺义，有只身打进敌军军部、俘敌军军长和军机关的孤胆英雄胡相法，有巾帼英雄甘文英，有荣获华东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桑金秋、魏来国、郑东明……他们不愧为当代青年的楷模。让我们以英雄为榜样，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，在保卫祖国，加强我军革命化、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中奋勇前进。

目 录

马天恩	(1)
马思进	(17)
王玉林	(34)
王 存	(56)
甘文英	(76)
刘吉尧	(103)
刘加其	(133)
郑东明	(150)
花国友	(165)
肖炳连	(190)
陈福胜	(213)
邱顺义	(232)
施刚魁	(257)
胡相法	(283)
桑金秋	(320)
郭天木	(354)
袁仲培	(373)
魏来国	(392)
董存瑞	(427)

马 天 恩

马天恩，一九二六年出生在河北省磁县马头镇。一九四九年五月参加革命，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华北医科大学，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成都总医院院长。

醉 酒 闹 学

在古老的马头镇，马天恩的家庭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。马天恩的祖父是个秀才，辛亥革命后在家乡办学，担任马头镇小学校长，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治学的严谨老人，在当地很受人们的敬重。一九二六年五月，他的长孙呱呱坠地，老人就有心让他的爱孙继承祖业。没想到，儿媳妇在产后三天就去世了。马天恩的祖父是个基督信徒，为了让长孙能够健康成长，担起祖辈家业，他抱着孙子去教堂洗礼时，在他信奉的耶稣面前，给孙子取名为“天恩”。意在渴求“主”的恩典，保佑孙子健康成长。

失去母亲的马天恩是跟着祖母长大的。老祖母把他视为掌上明珠，倍加宠爱。无忧无虑的马天恩在长辈的爱抚下渐渐长大。六岁时，爷爷把他牵进了小学。老人要他学习，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，是为了让孙子将来好光宗耀祖。老祖母常给孙子训导的是“书中自有乌纱帽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”……这些道理在马天恩

幼小的心灵中没有产生任何反响。他只觉得读书有趣，学校人多好玩，别的什么也不懂。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马天恩的家乡，同时也踏破了他的读书梦，刚刚考上高小的马天恩只得辍学了。这时，家里也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从此改变了他安稳的生活。就是这一年，镇上民众选举镇长，马天恩善良温厚的父亲被推上了镇长的位置。在敌占区被冠以这样的官衔，叫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难以接受。父亲生性耿直，为人师表，一贯轻视高官厚禄，对卖国求荣的伪政府也深恶痛绝。从当了镇长的那天起，就整日里愁锁眉头。当地下党组织开始在这片敌占区活动时，了解到他父亲的情况，就派人与他联系，动员他参加革命。正愁要解脱困境的父亲，毅然弃暗投明，率领他领导的镇上小武装投奔了共产党，并在后来加入了共产党。父亲的离走，使家里人担惊受怕，镇上稍有风吹草动，伪政府就要来他们家里抓人是问，每次都得重金去保释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爷爷去世了。在家主持家务的三叔，不再让侄儿马天恩去学堂念书，而是要他在家学习经商。才满十四岁的马天恩，死活不肯。他缠着三叔要他继续送他上学，可三叔就是不肯出钱。为此叔侄关系出现裂痕。还不懂得人情事变的马天恩，对于这突然的失宠甚不明白，于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一壶酒，“咕咕咕”一口气喝了下去。也不知道真是酒劲上来，还是借酒发挥，马天恩在自家的庭院里要起酒疯来。时而又跳又喊；时而迷迷糊糊，口里不停“念咒”。“我要读书，我要读书。爷爷留下的钱都是为供我上学的……”小孩子发了这样大的脾气，也着实把三叔吓懵了。他不知所措，也怕张扬出去失了体统。于是只好让步，答应出钱供马天恩继续念书。

在磁县开办私人诊所的姑姑，听说侄子“闹学”一事，心里十分赞赏马天恩的倔犟，她回到马头镇，与三叔达成了协议，由他俩共同负担马天恩的教育费用。在姑姑的一再请求下，三叔终于同意让马天恩去北平考学。一九四零年七月，马天恩以优异的成绩在北平考上了当时很有名气的“育英中学”。在姑姑的资助下，他平静地度过了五个寒暑的中学生活。

跃跃欲试

五年的中学生活，使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渐渐成长起来，马天恩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，开始跟着比他大的同学在一起讨论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开始成为一个担忧国家前途的热血青年。一九四五年这是马天恩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年，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。

在国难当头，民族危亡的时刻，他作出投身革命的决定，是经过一番磨难的。

一九四二年春节将至，学校放寒假，马天恩回到马头镇看望年迈的祖母。当祖孙相聚，互叙别情的时候，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家，他捎来了一别五年杳无音信的父亲的消息。父亲现在就在太行区磁武县的前方办事处。一家人听了真是又惊又喜，经过秘密商量，决定让马天恩代表全家前去探望。思念父亲急不可待的马天恩连夜准备了东西，随来人一起悄悄离开马头镇，星夜兼程来到了父亲的住处。

从敌占区来到根据地，马天恩的耳目为之一新。听人们唱起“打倒列强！打倒日本！”的歌，他受到了鼓舞。看着那些为国

为民，艰苦奋斗，生活艰难的革命志士，使他深受感动。一种为国为民，不甘当亡国奴的思想情绪油然而生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他产生了参军的念头。父亲与领导研究，准备送他去延安学习。延安——这个在同学们心中神秘的革命圣地。是马天恩向往已久的地方。想到马上就要投奔她的怀抱，他有些沉不住气了，走路又蹦又跳，喜悦之情溢满了稚气的脸庞。因为等待安排，马天恩在父亲那儿住了六七天。一天，不知是繁忙的父亲顾不了关照他，使他感到孤寂；还是突然想到要走了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奶奶、姑姑，马天恩产生了想家的念头。他想起此行的任务是来探望父亲，一家人还等着他的消息呢，不由得鼻子发酸，眼也红了。这情景让一个通讯员看到了，笑话他“象个小媳妇，多愁善感。”几句戏语逗得马天恩破涕为笑。他红着脸讲述了缘由。第二天，经同志们商量，决定叫他先回马头镇，安排好家事，然后再等联系去延安。

回到马头镇，祖母万分高兴。看着风尘仆仆的孙子，就如同见到儿子一样。她亲自下厨，为孙子做好吃的东西。看祖母一直处在兴头上，他不敢扫老人的兴。只把要去延安的事，悄悄告诉了姑姑，并叮嘱千万别让胆小怕事的三叔知道。瞅着机会，趁奶奶不注意时，他什么东西也没拿就走了。可他出门不久，祖母就知道了风声，她又哭又闹，硬逼家里人连夜追赶。还未走出磁县县境，马天恩就被家里人追回来了。老祖母在气头上，把一向格外疼爱的孙子给着实的训斥了一顿，并把他反锁在屋子里，直到马天恩答应老人放弃去延安，继续回北平念书的要求后，才把他放了出来。由于家庭的阻止，耽误了他去延安的机会。马天恩的抗争，终究未能冲破家庭的羁绊。在“家”的强制下，他只能乖乖地走仕途之路，不敢越出半步。

在家里人的“护送”下，他提着书箱回到了北平。到校后，他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。这段时间，他有意地接近学校里和外校的进步同学，并读了许多进步书籍。对他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巴金写的《爱情三部曲》、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讲话》。“渐变到突变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他开始了对社会发展、对现实生活、对人的新认识。他的心弦被觉慧强烈地拨动了，他有一颗象觉慧那样热烈跳动的心，可他这个人却象觉新一样被“家”紧紧地束缚着。他感到觉新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。要不是因是长孙，需要承担世袭“家”的封建礼义，他也可以象觉慧那样出走的。他恨自己没有冲破家庭束缚的勇气，他悔不该从根据地回来。他在自责和思考中又过了两年。一连串思不透理还乱的思绪，经常来干扰他，使他无法静心地坐在教室里。

一九四四年冬，他父亲接受党组织的派遣秘密回到了磁县。为给根据地筹备粮食，到敌占区马头镇附近的村子里征粮时，没想到被叛徒告密，暴露了行踪。为了引开敌人，掩护群众，他父亲拼命地往村外跑。那时节，田里的麦子还不及膝高，无处躲藏，马天恩的父亲被持枪的伪军打伤后抓走了，不久，便被惨无人道的敌人给活埋了。父亲的被捕，点燃了马天恩一腔熊熊的怒火，他立下了参加八路军继承父亲的志愿，并经常与挚友赵鹏飞一起谈论国事。以后，赵鹏飞先去了根据地，参加了八路军，并于次年带信给马天恩，要他回磁县有“要事相商”。这是他们曾经商定的暗语，即谁先到了根据地，都要设法通知对方。这次，赵鹏飞接受任务来到敌占区，立即给马天恩写了信。赵鹏飞与马天恩从小就在一个学校读书，既是同学又是朋友，俩人感情笃厚，情同手足。为了共同的志愿，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心又拴到

了一块儿。接到赵鹏飞的通知，马天恩丢下手中的书本，急忙回到磁县姑姑家里。他决定与赵鹏飞一同去冀鲁豫军区。这一次，马天恩格外慎重，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出走时谁也没有告诉。并且改名换姓，取了个王建辛的名字。只是在到达根据地以后，才分别给姑姑和刚结婚几个月的妻子寄了一封信，告诉她们，自己外出“谋生”去了。

雏 鹰 亮 翅

带了二十元伪币，马天恩和赵鹏飞就匆匆上路了。他们怕引起人们怀疑，连火车也不敢去坐，只得徒步踏沙涉水。冀鲁豫军区当时在华北平原的南部，要到达那里，还得过沙区踏河流。这一带传说是“梁山好汉”出没的地方。他俩边走边谈，议论着根据地的情况，此时，他们心中也充慎了一种相似“好汉”们打天下的豪壮气概。但他们两人必竟都是文弱书生，从没有走过远路，一天，两天，第三天才走出八十多华里，脚板打起了血泡，双脚胀痛，每挪出一步都感到困难，体力消耗尽了，支配前进的就是毅力了。他们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，就是爬也要爬到根据地去。虽然当时他们并无那种当兵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认识，但他们对敌占区腐败的社会现象再也看不下去，再也不愿当亡国奴了，他们向往根据地人民当家作主，向往八路军官兵一致的民主。他们议论，在八路军部队里，当官的和当兵的吃住在一起，首长夜里还给战士掖被子，训练休息时当官的还给士兵倒水喝，很多事情都是官兵一起讨论决定的。想起这些，他们都很激动，这种民主的空气，在一切都由长辈主宰的封建家庭是看不

到的。所以，他们俩都感到非常新鲜。说实话，这种新鲜感，叫现在的青年来评价，那就不足挂齿了。真是平凡而普通的小事，心中绝不会产生象他们这样激动的涟漪。

经过几天的艰苦旅程，他俩到了安阳县城，按照赵鹏飞打听的地点，在城东的吕村集找到了联络地点。那是集上一家老字号的“正有堂药铺。”一块黑漆底烫金字的木匾，在这块匾下，他迈开了革命的第一步。

店里的“掌柜”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俩。并通过地下交通员与冀鲁豫军区取得了联系。不久，解放区来人把他俩和一批从敌占区来的学生都接了过去。穿上军装后，马天恩被分到随营学校集训。在军校里，军事训练，这是马天恩遇到的又一个困难。操场上列队训练，反复的刺杀动作，俯卧着练瞄准，枯燥而单调。这生活并不是处处都有新奇感的，也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神妙和浪漫；他有些疲惫不堪。在军事训练的余暇，他们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《论联合政府》的政治报告。他认识到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，党领导革命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，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。他内心开始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。党制定的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，在我党的领导下，打败日本侵略者，解放全国人民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”的总路线，成为鼓舞他革命斗志的力量。他开始由一种向往、追求的“理想型”向用实际行动干革命的“实践型”转变，过渡。在刻苦的锻炼下，马天恩军事训练的各项成绩都有了突进。向他这样有文化的人，在当时的部队里还不多，领导和战友们都把他们视为“知识分子。”连队办黑板报、搞宣传的任务都分派给他去做；

为此，他是感到很自豪的。在随营学校毕业后，他就被分配到《战友报》社通联科当记者。这使他更感到“英雄有用武之地。”

一九四五年底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不久，蒋介石为独占胜利果实，违背《双十协定》，继续调遣大批部队沿平绥、同蒲、平汉、津浦等线向华北、东北疾进。国内形势日趋紧张。为了消灭和阻止北进之敌，保卫华北根据地，掩护我军在东北展开，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，我军准备给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以沉重打击。为了鼓舞士气，让人们认清革命形势，马天恩经常到部队各处去采访、组稿，晚上回来又秉烛夜战赶稿。当时，在他笔下写了多少篇激励人心的消息、通讯，他已无法统计，但是许多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，至今他还记忆犹新。一个个英雄倒下了，一个个英名就在他的笔下耸立起来，一座座丰碑也便建造在人们的心中。一九四六年春节，军区机关团拜，领导根据形势所作的战略布署讲话他连夜整理出来，和夜班印刷厂的工人一起排版、校对，第二天就见报了。在部队引起很大反响，对鼓舞士气起了积极作用。领导评价他时说，“战士用枪为人民而战，你用笔为战士而战。”当年的马天恩年仅十九岁，但是他勤奋的工作赢得了大家交口称赞。

初 征 受 挫

风轻轻吹过，卷起了马天恩一段往事的回忆。他拿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纸，声音也变得沉重起来。“这是一张路条，我保存了四十年，它记载了我一生中又一次大的波折。”

一九四六年二月，根据当时的形势，军区所在地要转移，报

社也得跟着搬家。组织同意马天恩回马头镇探家。路条，就是那时的《战友报社》为他开的通行证明。

又踏上了家乡的田埂小路，他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愉快。阔别一年，他有多少话要给亲人畅叙，外面有许多新鲜事还要讲给他们听，他还想告诉他们，他是做了八路军战士回来告别的，革命不胜利，他不会再回家。幼稚的马天恩一心为自己编织美好的未来，没想到，命运的轨迹却改变了他前进的方向。

迈进自家的门槛，迎接他的是那个不让他读书的三叔和在家没有地位的继母。这个一生谨小慎微，只图维持着一家老少小康生活的叔叔，听说马天恩又参加了八路军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他连忙把侄子推进里屋，压低了嗓门叫马天恩不要大声张扬。他的家乡，当时敌我双方正展开拉锯式的争夺，三叔害怕国民党回来，把他抓去，这可是要砍脑壳的。于是，三叔又要了一个心计，从马天恩回来的那天起，并格外热情地款待他。三叔施了“缓兵之计。”他骗马天恩说，“我现在做生意有了钱，想继续供你去北平读书。”他深知“读书”二字对侄子的诱惑力。幼稚的马天恩在三叔和三婶的哄逼诱骗下，糊里糊涂地上了北平。他完全忘记自己已是一名军人，对这选择的后果和严重性他一点没有认识，好似一个“自由平民”一样，部队的纪律，军人的职责，革命的理想，在家庭的影响下全都忘在了脑后。

到了北京，他才深知受骗。三叔没有给他寄学费，连生活费也没有给。当时他的荷包里连买一个大饼的钱也没有了。醒悟过来的他，象一只被激怒的狮子。他向同学借了十块钱，这钱只够买回家路途一半的车费，坐了一段车后，他靠两条腿走向马头镇。一到镇上，他就找到区人民政府，把三叔和三婶控告了。当时

阻止别人参加革命是人民政府不允许的事，后来三婶还被区政府关了一个多月。从此，他再也没有认过这位三叔。他恨自己软弱，恨自己幼稚，恨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。他感到离开部队，自己就象断了线绳的风筝，只有随风飘落，他怅然若失。

这时，区委领导向他伸出了温暖的手，鼓励他勇敢地站起来迎接新的生活。并告诉他，除了参军，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可做，在区委的安排下，他回到母校马头镇小学任教。他把全部心血都融进教学工作，他想借工作来弥补过失，排遣心中的遗恨。在教人的同时，自己也懂得了怎么做人。这个时期，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升华，完成了由幼稚到成熟的转变。他借着教书的机会，向学生们灌输救国的道理，宣传共产党、八路军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好处。在孩子们幼小的心里播下红色的种子，还协助区委搞一些宣传活动。

白天，他和象小鸟一样叫个不停的学生们在一起，他得到了心灵的暂时平衡。傍晚，学生放学后，校园安静下来，他还是感到孤独和彷徨。他思念部队生龙活虎的生活，思念战友情、同志情，想再参军的念头时时在心中萌动。尤其是听到我军胜利的消息，他的这种欲望就更加强烈。他渴盼着，等待着，准备着再一次踏上革命征途。

二 次 出 征

冬去春来，一个新的希望带着绿的生机又飞到马天恩的身旁。解放区北方大学医学院来磁县招生，那是晋冀鲁豫军区办的一所部队大学。他报名应考了。这一次，他毫不犹豫地迈出了坚定的

步子，并下了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决心。

一九四七年七月，他被学校录取了。如果说第一次当兵只是他的一种爱国热情冲动，并含有为父报仇的私念的话，那么这一次出征，他已经把它看成是一种履行理想而又不容辞的责任了。

北方大学医学院（华北医科大学的前身），座落在山西潞城。说是一座大学校，但校园没一幢教学楼，教室里没有一张课桌。学员上课，坐在小木凳上，双膝一并就是课桌。甚至连课本也没有，每堂课的内容都全靠学生们自己记笔记。还是在毕业的那一年，每个学生才得到一套《内科学》，一个个真是高兴得不行，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。那时，教具、教学标本少得可怜，全校就只有一具尸体标本。这些困难对于学医的人来说，确实不利。神经、血管的走向；肌肉、骨骼的结构；尤其是大脑器官复杂的局部解剖，没有标本供直观的理解，学习《解剖学》、《生理学》、《外科学》等，难度都是可想而知。夜里已熄灯了，马天恩还和同学们借着烛光在标本室认标本，边看边画，边画边记。

学员中，有一多半的人来自部队，文化基础比较差，甭说记笔记，就是记写那些医学名词、医学术语都困难。课堂上咬笔杆，课后皱眉头的人真不少。马天恩就主动去帮助他们，一边为他们补习文化，一边又把老师当天讲的内容，再给他们重复一遍，而后把自己整理的笔记借给他们。在没有课本的情况下，这就帮助大伙解了大难。渐渐地他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，谁在学习中遇到难题，都要来找他。他呢，也不厌烦。时间一长他成了班上的“小先生。”同学们选举他做了“课代表。”这些事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可要天天坚持这样做，也不易。自己紧张地学，课时

间还要帮助别人。有时自己的作业只有靠熬夜加班才能作完。为了使每一个同学都跟上教学进度，他费了许多心思。把老师讲的重点内容摘录成卡片；总结归纳一些有规律的知识制成大表格来帮助同学们记忆。星期天大伙玩他制作的“扑克”都感到兴味盎然。他把《解剖学》、《生理学》、《中医学》、《药理学》上的名称、作用、功能、正常值、原理、病因等难理解记忆的问题写在纸牌上，同学们一边玩牌，一边学习。一方提问，一方解答，他当裁判，智力与娱乐相结合，使枯燥的记忆变得非常有意思。每次课堂测验，马天恩的成绩都名列前茅，他所帮助的那些同学也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好成绩。教员们都说，有“小先生”帮忙，给他们减轻了不少负担。

一年后，他当上了区队长。工作干得很出色，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。出师获胜，他心里非常兴奋，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荣誉。

金 榜 题 名

一九四七年期末，马天恩被华北医科大学授以“甲等模范”的称号。虽然当时连一张彩印的奖状都没有，可他的心里却非常激动。经过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曲折转变而赢得这份奖励，使他想起两年来自己走过的路。

在潞城的那段时间，生活非常艰苦。学校里没有一间学生宿舍，同学们都分住在农民家里。他才真正体察到中国农民贫苦的生活，他痛恨一切剥削制度，痛恨一切不合理的贫富悬殊现象。于是更自觉地注意在实际生活中改造世界观。

那时，学校集体伙房的做饭用煤全靠学生们自己去担，吃的粮食也自己去背。从学校到煤矿要走十七八公里山路。冬天，积雪覆盖着山路，一走一滑，行人踩过后，小路全是泥浆，越走在后面路越难行。马天恩每次都在担煤队伍的后面。因为他是同学们推选的经济委员，每次运煤他要和管理员一起统计数量，结帐。进城运粮工具少，他们就拿出自己的裤子来装粮，把裤腰和裤脚扎住，再把两条腿架在脖子上。一次次地这样担煤扛粮，在劳动中他用汗水洗刷旧家庭给他的影响。在校学习，谁都不愿承担过多的社会活动，怕分了精力影响学习。而象区队长，经济委员这样的工作又是必须要有人来干的。同学们选马天恩，他也从不推辞，总是把学习和他分管的工作做得很出色。有时改善伙食，他就和管理员一起步行去其它乡村换些白面给大伙蒸点馍馍吃。每顿饭后剩下多少窝窝头，他都要仔细点数，计划下顿怎么吃。这些烦琐的事马天恩都尽心尽力的去做，这花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但是他说：“条件差，就得精打细算。”

解放战争最后一年，为宣传我军的形势，让人民群众了解全国解放已为时不远，马天恩主动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宣传队，每天晚上和同学一起爬到农民的屋顶上，举着煤油灯照明，拿着铁筒喇叭，大声给村民读报讲报，尽管是严寒的冬天，但是马天恩和同学们都干得非常热心。

一九四八年初，学院搬到河北石家庄，与白求恩医科大学合并，改名为华北医学大学。

夏天，敌人突然进犯石家庄，派出飞机进行轰炸，学校师生员工的安全受到威胁，根据上级指示，学校要临时转移到束鹿农村去。马天恩是区队长，他要组织区队里的同学们搬迁。正在这